

的语视角下翻译的不对等问题研究

范云¹, 邓忠¹, 范振东²

(1. 重庆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030; 2. 南昌航空工业学院 外语系, 江西 南昌 330034)

摘要:实际翻译中经常出现原文和译文在各方面的不对等现象。本文首先回顾翻译研究领域对“对等”的研究成果,再把关注焦点放到作为例外的“不对等”现象上,在进一步分析不对等现象出现的原因和适宜程度等问题时,本文借助文化操纵理论,指出的语的文化底蕴和价值等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并对这方面的重要问题做出了描述性解释。

关键词:不对等;文化操纵;的语影响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4)03-0087-04

Reflections on Non-equival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ipulation

FAN Yun¹, DENG Zhong¹, FAN Zheng-dong²

(1.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China;

2.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chang Institute of Aerospace Technology, Nanchang 330034, China)

Abstract: Facts of non-equivalence are often traced in translation. Focusing on this, this paper reviews some reputable research outcomes in the respect of equivalence in the first place and, in an attempt to elaborate on the possible causes and appropriateness of non-equivalence, it introduces the approaches of manipulation and the related arguments, figuring out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identity of the target language are greatly attributed to this very phenomenon.

Key words: non-equivalence; manipulation; target-orientedness

一、引言

(一)关于“对等”的研究

自翻译研究发轫以来,“对等(equivalence)”的概念就长期处于研究解释的中心地带。借助20世纪中叶蓬勃发展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很多翻译家兼语言学家都试图以语言学研究作为契机来打开翻译对等研究的大门。R. Jakobson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一文中,最先分析了“对等”的概念,他认为翻译所涉及的对等是两种不同语符中两个对等的信息,翻译就要在不同语言现象中求得对等。同时,他对对等的实现较乐观,因为他认为一切人类语言都具有同等的表达能力(《翻译标准论》,P138)。Catford在他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中则认为,翻译中的对等是“所指对等”,原文和译文的对等可以在句子这一级层上实现,而在整个行文的层面来实现则不大可能(《翻译标准论》,P139)。而在“对等”问题上研究成果最丰的应是Nida,他以交际学为出发点,指出翻译的对等是动态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即“最贴近原语信息的自然对等”(谭载喜,1999:11-13)。他进一步认为,要“保存原作内容,必须改变形式”,在翻译中,“意思应优先”(谭载喜,1999:5,13)。O. Kade也依靠交际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在任何转换过程中,语义的对等是第一位的,他把对等关系分成四类:完全对等、选择对等、近似对等和零位对等,颇有启发意义(《翻译标准论》,P142)。除此以外,A. Neubert按照可译性程度,也把对等划分成为几个不同的等级,指出对等应该针对不同原文问题有不同的侧重(《翻译标准论》,P142),这类似于A. Lefevere & S. Bassnett(2001:1)所提出的“具体对等(specific equivalence)”概念,把以往一个单独的“对等”进行了细化和灵活处理,是“对等”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

一方面理论家们在理论上孜孜不倦地追求“对等”,并且取得了公认的成就,另一方面“不对等”现象却总是在翻译实践中挥之不去,频繁地困扰着学者和译家。而且人们也逐渐发现,理论进展的程度远远解

决不了实际中出现的问题,这样那样的理论假设也屡屡被颠覆或推翻,因为每个理论在进行阐释的时候都往往是在追求某一个层面的成功,例如 R. Jackbson 注重的是信息对等, Catford 侧重于句子层面, Nida 把注意力放在了交际过程和受众反馈的问题上,似乎都没有能够覆盖尽可能多的参与因素,同时,“不对等”仅仅是他们理论的副产品,没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研究。

(二)“不对等”现象

似乎很难对“不对等”下一个精确定义,因为它是“对等”的反面,而“对等”本身也是从不同方面得以界定的。翻译实践表明,“不对等”是翻译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因此“不对等”不能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误译”。如果遵照上文对“对等”研究角度的分类,那么“不对等”也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信息量的不对等,这多是由原文和译文在词汇层面的对等空缺或行文方式不一致引起,如:继续开辟和疏通多种渠道,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We should continue to open channels to guarantee the people's democratic rights. 这里仅译出了“继续”,“切实”被省去未译,而“多种”由名词复数承担;同时,原文无主语的祈使句被换成了有主语的句子。(《汉英时文翻译》,P93)(2)功能上的不对等,如:小心滑倒!(多见于餐厅或宾馆)Wet Floor! 从字面上看,不难发现原文的功能在于提醒人们注意,而译文仅仅是道出“地板是湿的”这个事实,属于 Halliday 概念功能的范畴,这两者并未说一回事,而只有在结合具体语境考虑的情况下译文才能被更好接受。(3)文化意义的不对等,如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有这么一段话:He made you a highway to my bed; But I, a maid, die maiden-widowed. 这段话若不做处理,应译为:他本要借你做捷径,登上我的床;可怜我这处女,活守寡,到死是处女。而朱生豪的译文是:他要借你做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这个译本里明显把原文中“处女”、“活守寡”等字眼隐去了,这不能不说是译者在文化意义上的考虑(《译介学》,P7)。这些例子都证明了译者们由于种种原因在允许着自己的译文出现“不对等”情况。借助文化操纵的观点并从语的角度出发,有助于获得对“不对等”问题的更清楚认识。

二、文化操纵(manipulation)及其相关的理论思潮

(一)“低地(Low Countries)”国家的强劲势头和文化操纵的理论重点

翻译研究曾在语言学理论的强大支撑下取得了巨大成就,包括“对等”在内的很多重要问题都得到较好说明,然而,语言学(甚至后来的交际学、信息科学等)在某些翻译的实际问题(尤其是文学翻译)上表现

了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以荷兰、以色列等国家(称之为“低地”国家)的学者如 Holmes, Even-Zohar, G. Toury, A. Lefevere, S. Bassnett 等开始把目光投向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给翻译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他们强调翻译研究的理论模式与具体的翻译研究应该相互借鉴,主张描述性的翻译研究,尤其重视翻译的结果和体系,他们还致力于研究各种制约和影响翻译结果和翻译接受的因素,强调的语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对翻译可能施加的压力(谢天振,1999:97-98)。文化操纵观是他们一系列理论中重要的一环,又跟其他环节紧密联系。操纵的观点跟多元系统(polysystem)的假说密不可分,在 Lefevere 看来,文学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而文学系统具备双重操控机制,一个是外部机制,由赞助人(patronage)和意识形态(ideology)起重要作用;内部机制则是在文学内部通过诗学(poetics)等概念起作用。Even-Zohar 进一步探讨了在文学系统内的小版块(subdivision),认为文学翻译是其中之一,并在努力争取主导地位(王友贵,2003:11)。不管怎样,他们的理论要说明一点,所有的翻译都是一种文化“改写(rewriting)”,都是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实施的某种程度的操纵(Hermans, 1985,《翻译研究-综合法》,P22)。而 Toury (2001)直接在他《描述翻译学及其他》一书中提出了 target-orientedness 的观点,把注意力集中放在了翻译结果上,认为的语有很多参数(parameters)影响着翻译结果的生成,因此应作为研究重点。

(二)操纵对“不对等”的解释力

文化操纵及其相关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它们关注的语的真实情况,关注以前翻译研究经常忽略的一些因素,如哪些文本会被翻译?谁来翻译?翻译后的结果会怎样?这为解释“不对等”现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完全可从的语出发(而不像以往那样从原语出发)对“不对等”问题进行更清楚的描述性说明。

的语中有哪些因素造成了“不对等”?这些因素如何起作用? A. Lefevere 提出的操纵机制和三个操纵因素是很好的答案。当然,除了这三个因素,还有其他学者找到了别的着眼点,如 Bassnett 主张翻译研究已经在经历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因此应更注重文化层面的分析,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见解,但文化本身的内部结构相当复杂,所谓的文化研究往往是集中在其中的某些层面。从这个意义上,把意识形态作为的语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应该是操作性很强的途径,国内的学者如孙艺风(2003)、王友贵(2003)等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还有的学者主张从历史角度看的语对原语的操纵,很注意在操纵过程中文学性的保

留问题,如 Toury 提出了翻译的各种准则(norms),这同样是对上述问题的很好回答。本文以 A. Leferfere 的三大因素为基础,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外部因素)和诗学(内部因素)两个要点,分析它们各自对原语的操纵情况,从而找到解释“不对等”现象的新证据。

三、“不对等”的描述性解释

(一)意识形态的规约作用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光盘版),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而且还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这个定义表明,任何社会都有其基本统一的对待客观世界的观点,同时,正因为意识形态构成了观念的上层建筑,它显然具有对社会活动和社会成员的规约性,在一定意识形态下,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等问题受到了基本意义上的规定。翻译活动自然在被规约的范围之内,简言之,译文应该是什么样子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的语的意识形态所规约并所能允许的程度:的语意识形态能接受的就会得到保留,不能接受的则会被改写甚至是抛弃。这就是造成不对等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上文所举的莎士比亚作品翻译的例子,在汉语的意识形态里,男女肌肤之亲本来就不是可以登上大雅之堂的话题,汉语里已经有很多词汇来尽讳饰(euphemism)之能,如耳鬓厮摩、巫山云雨等,而那些与此相关的词汇就更不能直接表达。因此,在这样的规约下,朱先生没有直接翻译原文的词汇,而用了其他更为隐晦的表述方式,从而引起了不对等。类似例子比比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总会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控制自己,这点在意识形态浓厚和道德规范严整的社会里更常见。当然,意识形态还包括了话语权力的因素,这同样或多或少造成了翻译的不对等,比如在中国的晚清时期,有权力的话语是文言文,因此几乎所有的中文译本都是以文言文形式出现,其中的不对等现象较突出,尤其在小说和诗歌的翻译上更是如此,以周桂笙翻译的法国作家鲍福的小说《毒蛇圈》为例,译者首先把原文改造成中国的章回体小说的样式,原作被分成几十回,每回都有一个章回体标题,如“孝娃娃委屈承欢,史太太殷勤访友”,“几文钱夫妻成陌路,一杯酒朋友脱交情”等,而且每回结束都有“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说”的话语,这显然构成了严重的不对等,都是在话语权力下译者对原文的“叛逆”(谢天振,1999:170)。政治权力的影响也是意识形态范畴里的重要因素,在

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绝大多数外国翻译的作品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代表,幸存的少数作品被译者们改得几乎面目全非,全都扣上了“阶级斗争”、“反对‘封’、‘资’、‘修’”的帽子,也都变成了千篇一律的样板戏。

(二)诗学和文学性(literariness)问题的影响

如果说意识形态是译者不得不服从的硬性原则,保留原文文学性的问题则在更大程度上是译者主观努力实现的目标。对任何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表明,一种语言的某种表达很难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完全匹配(perfectly matched)的对应表达。这时译者大致有两个选择,一是“保存原作的丰姿”,“宁信而不顺”(鲁迅语,《翻译标准论》,P13),另一种是“化境”(钱钟书语,《翻译标准论》,P16),即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就很多翻译学者而言,他们更为推崇后者,谢天振(1999:208)明确指出译作应是文学作品在另一种语言中的存在形式,译作应挖掘的语的诗学特点,从而保存原作的文学性特征;许渊冲尤其重视译作的文学性问题,在《关于翻译学的论战》中,他提到了对毛泽东词《昆仑》的英译问题,原文译文对照如下:(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遗美,一截还东国。I'll give to Europe your crest, and to America your breast, and leave in the Orient the rest.许先生认为这种处理办法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译文优势,并且节奏明快、压韵工整,做到了与原文的神似。但不难发现,为保护译文的文学性特征,原文和译文的不对等现象难以避免,有时译者在万般权衡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在文学性上的努力。事实上,这样做有很大风险,因为翻译界长期以来把“信”和“忠实”看作是第一要义。但越来越多的翻译实践和研究表明(谢天振,1999:137),创造性和叛逆性根本无法分割。叛逆性指译者为了某种目的(尤其是文学性目的)对原文的再创作,这是译者对原文主观操纵的重要表现。Robert Escarpit(《译介学》,P137)说得更加清楚:“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

(三)“不对等”的适宜度问题

根据文化操纵观点,原文总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在翻译中被修改,而译文不可能完全与原文对等。到底多大程度的“不对等”可被接受呢?这里显然有两方面压力,一是谁都不能忽视译文去忠实原文的必要性,二是必须看到有太多太复杂的的语因素使译者们不得不造成译文的不对等。本文认为,既然不对等现象是既存的事实,译者首先应努力减少由自身理解或表达问题而造成的“不对等”。马红军(2000:107)

曾举了下面一个句子翻译的例子,从中可看到这种过失性不对等的危害:In Europe, Heath's name was well known, if not a household word. 在欧洲,希斯的名声是很响亮的,纵使不是家喻户晓的话。这里译者误解了“if not”的含义,正确的译法:在欧洲,希斯的名字广为人知,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译者的稍不注意就导致了严重的不对等,这样的情况应坚决杜绝。当然,更多的“不对等”不是用正确或错误一概而论的,尤其是那些被迫的“不对等”和主观上的创造性叛逆更是缺乏硬性的尺度衡量。在这种情况下,本文认为,衡量“不对等”的适宜程度时不应单纯把原文和译文进行文本层面的比较,而应站在翻译目的和的语文化的角度检验:(1)意识形态层面上翻译的预期目的(教育、激励、讽刺等)是否达到。(2)译文在的语文化里是否具有生命力。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显然译者对原文的操纵就是成功的,译文的“不对等”自然也可以接受。这样的检验标准尤其适用于对文学作品翻译的评判,以电影名称的翻译为例,译名“不对等”现象非常明显,但一旦一个译名被固定,“不对等”都被认为是适宜的了。如很多获得2001-2002年度主要电影奖项(奥斯卡金像奖、嘎纳国际电影节、柏林国际电影节、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东京国际电影节、英国电影学院奖)的国外影片的汉语译名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有的甚至是严重的“不对等”,其中有按照故事情节重新命名的,如意大利影片 *Malena* 被译成了《西西里岛美丽传说》;也有把原名中主人公姓名隐去的,如美国影片 *Charlotte Gray* 被译作《乱世有情天》;还有把原名引申发散的,如美国影片 *Signs* 被译为《玉米地的符号》(《电影天堂》,2003)。先不讨论译者是出于何种考虑才做出如此显著的修改,我们发现这些译名都被人们固定下来,并见诸于国内的重要媒体,从这个意义上,译名是成功的,这些“不对等”可以容忍,甚至还有助于影片在中国的影响。当然,这样的检验方法不是立竿见影的,它需要时间,也许这是一个它作为检验方法的不足之处,但它的公正和可信不可否认。

四、结束语

本文就翻译的“不对等”现象进行了的语层面的分析和讨论,尤其通过意识形态和诗学两个平台研究了“不对等”的原因和适宜度问题。在试图把“不对等”现象解释清楚的同时,还大量引用文化操纵及其

相关论点,认为这是翻译理论中一套很有特点、很有说服力的思想倾向。但同时限于篇幅,本文对“不对等”问题的解释更多是集中在文学作品领域,对其他非文学的文本没有做太深入的分析,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 [1] EVEN-ZOHAR I. Polysystem Studies [EB/OL]. <http://www.tau.ac.il/~itamarez/papers>, 2004-02-11.
- [2] G TURR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3] M HORNBY. 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4] S BASSNET, A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5] WOLFRAM WILSS.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Problems and Method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6] 编委会. 电影天堂 [M].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3.
- [7] 贾文波. 汉英时文翻译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 [8] 姜治文, 文军. 翻译标准论 [C].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 [9] 马红军. 翻译批评散论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 [10] 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增订版)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 [11] 孙艺凤. 翻译研究与意识形态: 拓展跨文化对话的空间 [J]. 中国翻译, 2003, (5): 4-10.
- [12] 孙艺凤. 翻译规范与主体意识 [J]. 中国翻译, 2003, (3): 3-9.
- [13] 谭载喜. 新编奈达论翻译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 [14] 王友贵. 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 [J]. 中国翻译, 2003, (5): 11-15.
- [15] 萧立明. 新译学论稿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 [16] 谢天振. 译介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 [17] 许渊冲. 关于翻译学的论战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1, (11): 19-20.
- [18] 编委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 [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